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KANGRI ZHANZHENG SHIQI DE
XI'AN BABAN

抗日战争时期的 西安八办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KANGRI ZHANZHENG SHI QI DE
XI'AN BABAN

抗日战争时期的 西安八办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2015 重印)

ISBN 978 - 7 - 224 - 03931 - 3

I. ①抗… II. ①中… ②八… III. ①八路军—军事机关—史料—西安市 IV. ①E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3195 号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

编 者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32 开 9.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3931 - 3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活动综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大事记	(17)

历史文献

伍云甫关于西安办事处工作情况致中共中央的信 (1937年11月24日)	(33)
伍云甫关于宣侠父无下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8年8月2日)	(35)
西安办事处工作报告(1938年8月)	(36)
西办党的工作(1938年8月)	(52)
伍云甫为国民党军特务四团阻碍八路军运输 致天水行营电(1939年2月4日)	(55)
林伯渠为请释陈希愈等人事致陕西省主席电 (1939年3月18日)	(57)
林伯渠为陇东事件致程主任电(1939年4月29日)	(58)
林伯渠为国民党军屡次扣押八路军人员、物资事 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4日)	(60)
林伯渠伍云甫为旬邑武装冲突事件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5月29日)	(62)
林伯渠为旬邑国民党军进攻事致天水行营、陕西 省政府电(1939年5月29日)	(63)
林伯渠为请制止地方武装冲突致孔院长电	

(1939 年 6 月 6 日)	(64)
林伯渠为旬邑事件致天水行营电(1939 年 6 月 15 日)	(66)
林伯渠伍云甫为要求赔偿汽车损件及失物事致天水行营电	
(1939 年 11 月 17 日)	(68)
林伯渠为制止何绍南摩擦事致天水行营电	
(1939 年 12 月 6 日)	(70)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伍云甫电(1941 年 1 月 15 日)	(72)
西安近况与办事处半年来的工作(1941 年 6 月)	(73)

研究和回忆

毛泽东和西安八办	王 嵩(83)
周恩来在西安八办	李珍珠(88)
朱德在西安八办	金 源(93)
刘少奇在七贤庄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杨 武(97)
董必武重返七贤庄	刘彤璧(99)
同国民党顽固派何绍南的斗争	彭德怀(102)
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	齐佩芝(104)
林伯渠在西安八办	《林伯渠传》编写组(107)
冯海伯牙科诊所	刘 鼎(114)
由诊所到红联处	罗瑞卿 吕正操 王炳南(116)
西安红军联络处	童小鹏(118)
伍云甫日记摘抄	(121)
西办的联络工作	李初黎(129)
设立采办委员会	殷承祯(132)
西办的采购工作	王 政(134)
在洛阳采购的回忆	王荫圃(136)
西办各兵站情况	朱运臣(137)
在西安八办的几件事	陈福初(138)

回忆西办秘书科	孔石泉(143)
西办的会计工作	曹根全(147)
电波传遍四面八方	林 青(148)
办事处的业余活动	谭 冰(150)
中共陕西省委与西办	赵伯平(153)
《西北》周刊鼓呼抗日	徐彬如(155)
携带《西北》周刊脱险记	史 悦(161)
西安民先队的抗日活动	朱 平(163)
慰问朱总司令	杨 克(166)
走向革命历程的起点	刘 伍(167)
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	崔海潮等(173)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	丁 玲(180)
流亡孩子抗战剧团	李 琦(186)
西办与河南四川地方党	王哲然(187)
培养抗战人才的摇篮——抗大陕公	李维汉(189)
招生工作追忆	王邦屏(192)
紧张的招生接待工作	刘 潜(195)
走向延安	陈慕华(197)
辗转奔陕北	王腾波(203)
到革命圣地去	章 岩(207)
难忘的岁月	李晋昭(209)
女扮男装赴延安	王淑敏(214)
“八路军上士文书”	华君武(218)
从马来亚到陕北高原	陈 明(219)
从海外到延安	谭 岚(226)
白求恩日记摘抄	(230)
随白求恩到红区	琼·尤恩(232)
寻觅当年的踪迹	海伦·斯诺(241)

访问延安的回忆	瓦尔特·博斯哈德(246)
印度援华医疗队	巴苏华(250)
顽固派摩擦令人痛恨	肖劲光(253)
以斗争求团结	周子健(255)
三过办事处	南汉宸(266)
从苏联归国旅途	师哲(267)
数月之后终获释	陈希愈(269)
七贤庄关心着我们	李克林(276)
发售《新华日报》	王书枫(278)
西安街头偶救西路军战士	王红云(280)
从新疆回延安	李映光(284)
百子一条心 集体回延安	高登榜(287)
国民党特务对八办严密监视	王友直(295)
西安办事处被迫撤退	王还寿(304)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结束使命	王浩礼(306)

附 录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简况	行梅(313)
从观众留言看纪念馆的社会教育作用	齐佩芝(316)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活动综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西办)是国民党、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胜利的产物。从它的前身冯海伯牙科诊所、红军联络处开始到最后撤离西安,共计十年时间,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十年间,这个在全国数十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创建最早撤离最晚的机构,利用它特殊的政治和地理地位,在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联系与沟通;为八路军领取款项、采购物资,做好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组织广大国统区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前线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光荣的历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一、西安八办的建立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设立办事处。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的牌子。

早在1936年春末,西安七贤庄十套院落成之初,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就用200块银元做押金,租下了一号院,以“冯海伯牙科诊所”为掩护,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转运站。在西安事变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秘密联络转运站,除了出色地完成采集并向西北苏区转运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紧缺物品外,还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中共中央设在保安(今志丹)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全国各地去。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代表陆续到达西安。先是叶剑英、左权等住在七贤庄一号,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罗瑞卿等亦由张学良公馆迁到这里,代表中共中央同事变各方共同协商,谋求团结抗日之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七贤庄一号院便成为红军联络处,又称中国红军西北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发展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络团结工作;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办西北苏区和红军部队所急需的粮秣、服装、武器等物品。由于这时共产党还未与国民党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红军联络处只是半公开的办事机构,因此,一号院大门外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三十八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其工作由叶剑英总负责,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秘书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红军联络处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与充实,林伯渠(林祖涵)、宣侠父、叶季壮、伍云甫等先后赴西安,为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做准备。

8月25日,西办正式成立。办事处诸同志及时将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怀就职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发给西安各界及各机关团体。通电引起极大的反响,爱国知名人士、政界要人、军界将领和抗战团体纷纷致电致函,表示热烈祝贺。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于是七贤庄一号门口改换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长条木牌。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负责人员有,处长:伍云甫(1937年8月~1942年初)、周子健(1942年初~1946年9月)。副处长:李华(1939年初~1941

年)。

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1937年8月~1940年10月)、董必武(1940年10月~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1937年8月~1938年7月31日)也长驻西办,实际指导西办的工作。

二、西安八办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

(一)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是抗日的大后方,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这里汇集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西安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西办肩负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人民群众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西办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西办曾协助中共陕西省委发动西安群众救亡运动。通过西安地区建立的二十多个救亡团体,把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干部在西办工作,其联络员常驻西办。二者的密切配合为组织协调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西办工作人员经常到社会上去,向各界群众进行演讲、讲课、演出。林伯渠带头应邀在省立二中和扶轮社讲课。伍云甫在铭贤中学做《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举办骨干训练班,请宣侠父去讲“怎样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还请过往留住西办的彭德怀去讲“怎样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游击战术”等课。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八路军东渡黄河连战告捷,军威大振的情况下,西安许多学校、团体不仅采取各种形式热烈拥护八路军,而且竞相邀请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去演讲。西办有求必应,利用一切时机扩大宣传。西办组织的宣传队在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送郎上前线》《汉奸作寿》等宣传抗日的节目。西办还组织全体人员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前线的战况,增强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1937年11月,西

安同仁医院副院长罗锦文联络一些医护人员,组成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西办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救护队。西办还动员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亡,搞募捐,并把群众捐献的寒衣等物转运到前线去。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就给西安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时刻,爱国志士及各团体十分渴望聆听他对时局的远见卓识。1937年11月,周恩来由山西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在办事处留住一天,西办全体人员动手,印发请柬,布置会场,周恩来给西安各界300多人做了《五个月抗战的总结》的报告。1938年3月,周恩来在省立二中就抗日问题给学生们做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报告。许多当年亲耳聆听者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操场上挤满了人,连墙头、树杈上都坐着不少听报告的人。在长达三小时的讲话中,会场是那样的肃静,又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其盛况在西安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周恩来在西安还做过《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演讲。这些都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与各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刘古风、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张知道、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些知名人士很仰重周恩来、朱德总司令,西办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安排会见。他们中许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和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如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就是这样。他积极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扣人心弦的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就是该校任用的教师。车向忱还亲自向西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东北军调离陕西后,他办的学校经费发生了困难,西办从统战经费中每月抽出200元发给学校,使学校度过了难关。还有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的杜斌丞先生,竭力支持并帮助西办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身居要职的特殊条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陈建晨主编的《大团结》刊载过林伯渠、宣侠

父的讲话,向国民党管辖区各界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更可贵的是他开办纺织厂,招收抗日军人家属进厂做工,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积极的工作。

西办在接待安排全国各地来西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单位的过程中,也做出了贡献。1938年3月初,著名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进行演出。为争取“西战团”在西安活动的合法地位,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利用他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蒋铭三)、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师生、学友的特殊关系,陪同丁玲会见这些达官要人。“西战团”33名团员齐心协力,演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了座谈会、纪念会,声势浩大,轰动了古城西安。蒋鼎文给“西战团”捐款200元,胡宗南邀请丁玲、宣侠父赴宴。“西战团”在西安站住了脚跟,坚持演出达四个月之久,1938年7月回到延安。抗战初期,宋之的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樊镜秋率领的难民孩子剧团、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在来西安演出过程中,都得到过西办的支持与帮助。

发行共产党的书刊,是西办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办千方百计地做好发行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1937年10月26日,西办在北大街通济坊375号开设了《解放》周刊分销处,还承担了销售武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任务。《解放》和《新华日报》在西安备受欢迎,群众踊跃购买,互相传阅,时常出现夜半叩门和拂晓等在门口候买的动人情景。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西办除将两报刊张贴在来往行人多的闹市区外,还在七贤庄一号院临街的窗口设立销售处,在平民坊、马坊门、土地庙十字的书店设立代售点,同时还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并与进步的报社、书店建立联系,向外地区、外县发售书报刊物,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扩大了宣传面。

西办还肩负着做好国民党西安军政上层领导人的统战工作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通过西办这个据点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经常致力于上层统战工作。1940年5月,周恩来

赴重庆、朱德回延安途经西安时,他们两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先后分别访问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中华邮政总局军邮总视察林卓午、驻陕军邮局局长西密司、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副部长卢佐以及谷正鼎、郭紫峻、周心茗等,接待了西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温起凡、杨明轩、刘古风、卢竟群的来访。他们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的接触,为巩固西安各界团结抗日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林伯渠作为中共驻陕代表,也很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和一些上层人士交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使得他们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卓午是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负责晋、陕等省的军邮工作,在西安设有办事处。林伯渠与其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帮助其积极开辟战区邮路,沟通边区与国统区的联系。从1938年4月起,由西安至延安通邮,邮件由西办汽车队带运。三原至绥德的邮路也切实得到了整顿。为了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诚意,以及激励林卓午的爱国热忱,1940年5月,周恩来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给驻陕军邮局四五十名职工讲了话,并给林卓午赠送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1942年,林卓午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亲切会见。

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38年秋天,由“抗大”毕业的陈希愈等奔赴敌后工作,途中被一小撮顽固分子扣留监禁。消息传到西办后,林伯渠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交涉。经过一番努力,程在公文上批了“合作救国,立即释放”。1939年10月间,西安某汽车兵团几个歹徒把西办的五辆汽车偷走。西办人员抓获歹徒后,得到程潜等人的秉公办理,使西办的汽车失而复得。

帮助抗日友军的刷新与整顿,是西办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与友军之间,互相帮助,互通情况,有时互通战报。西安有师以上部队的办事处100多个,都与西办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八路军在前线打了胜仗,友军办事处都表示祝贺;友军在前方打了胜仗,西办也去人

表示祝贺。友军、地方武装还要求八路军给他们派干部,帮助他们刷新、整顿部队;有些还将他们的干部送来,要求进“抗大”学习,以便返回后更好地工作,西办都尽力满足其要求。1938年6月以前,通过西办派到友军去工作的计有:新编六师13人,十七师8人,八十三师5人,十四集团军2人,山东第六游击区12人,晋东游击队12人,晋南游击队10人,陕西警卫二旅2人;派到地方去工作的计有:河南12人,陕西16人,山西1人,江苏7人,山东3人,浙江6人,四川7人,安徽9人。对于在友军中担任高级职务,要求进延安参加学习或别有任务的,如何基沔、张克侠、何柱国等,西办都派专人护送前往。1938年3月,张克侠住在西办时,突发急性阑尾炎,被正在办事处住着要去延安的白求恩大夫碰上了,他马上在地下室架起了简易手术台,顺利地给张做了手术。

接待好每一位外国朋友与客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西办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在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的时候,一些国际友人、海外爱国侨胞克服各种困难,前往延安。有的是考察情况,向外界做出公正的报道;有的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外国友人有: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范查理、白求恩、马海德、路易·艾黎、米勒、詹金斯、伊文思、爱泼斯坦,等等。外国团体有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等。这些经过西安的国际友人,都得到西办从生活、交通及安全等方面的周到安排。

(二)采购运输物资

从1936年春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联络转运站到1941年年底,西办是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后勤供给的中枢站。它承担的采购运输任务很重,工作人员仅西办经理科就多至近百人,下属有好几个仓库、兵站,还有一个汽车队。延安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原材料、生活用品、文化办公用品,不少是由西办经理科采购供给的;前方八路军的经费、服装、医疗卫生用品、弹药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西办经理科领送和采购的。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后勤供给工作,在西安事变以后,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率领一些同志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成立了与西办(红军联络处)

平行的“采办委员会”，设粮秣、采办、交际等科。其工作任务是：采买延安和红军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办理服装、鞍具等军用品的加工；运送采买及加工的各类物品到延安或红军驻地。此时，尽管国共合作尚未正式开始，但已有了合作的气氛，因此“采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西办成立后，“采委”改为经理科隶属西办，主管军需供给工作的各项事宜，原各科改为股，张元培、吴习智、汤池、喻杰先后做过科长。经理科的工作任务除过去的采买物资、服装制作外，又增加了领取款项、运送物资诸项。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初，其军饷、军需品等均由国民政府定期发给，还不定期地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等。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由太原迁到西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领取由西办在西安办理。1940年11月，何应钦得蒋介石指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在这以前拖欠未发的也予以作废。

除领取军费外，西办还到驻陕军医署、驻晋军医署，领取战场救护药品、卫生材料、医疗器械和疫苗；到华阴、宝鸡、襄樊、汉阳军械库，领取由军委会配发的步枪、手榴弹、子弹、机关枪、小炮、被服等。

八路军制作服装、军革件需要的布匹、棉花、皮革等原料，由军需局统管价拨，质量高、价钱低，但数量有限。经理科的工作人员利用关系，想方设法到军需局指定的厂家、地区采办较好较多的原料，再交给工厂加工。1938年上半年用这种办法，购买到6600多匹布，节约4万元。当时，西安只有同和、永兴、万聚、裕生祥、典园、同聚等7家军装加工厂。由于在西安制作军装的部队多，经理科除在西安联系了几家工厂外，还在咸阳、武汉等地联系厂家，在各处制作军装。但唯利是图的厂家也是有的。1937年，西办在西安南院门裕生祥加工的一批军装，送到山西前线后，发现质量太差，尺寸不够规格，缝合处开缝，以次料充好料。根据左权副参谋长的反映，八路军留守处派王力生等人到西安调查，从中吸取了验收教训。从此，经理科规定，每次制作服装要先订合同，按合同办事，并对经办人规定了必须遵守的纪律，堵塞了漏洞；同时还注意发挥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以保证质量。成东制革厂经理董耀东是共产党员，西北化学制革厂协理向蕴生曾是共产

党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八路军加工了大量的枪衣、炮衣、鞍具,还为延安支援了制革机械、原料以及技术人员等,帮助边区建立了制革厂。

除了领取和制作军服、军需品外,为了满足部队和边区的需要,西办扩大了采买范围。1938年上半年,采买的物品有:鞋、皮革、纸张、簿记本、蜡烛、香烟、肥皂、自行车、行军锅,以及通讯、兵工、卫生材料等,还有一些特需物品,例如毛泽东要买的各种书籍、报刊等。

从1939年开始,西办给延安采购运输各种机械、金属、化工原料等生产资料,为边区发展工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陕甘宁边区的纺织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新华化学厂以及几个小兵工厂,就是用西办在西安采办的各种机器、工具、材料一步步建设起来的。

在运输方面,1936年和1937年,西办主要靠借用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的汽车,同时雇用商车,把采买到的物品运往陕北。以后在爱国商人李雅轩的帮助下,开始买车。1937年9月,西办成立了汽车队,到1939年拥有22辆汽车。汽车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承担着大量的运输任务。1937年到1938年,西安城内的汽车约有300辆,和西办签订过合同关系的达120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和朱德总司令会面时,对合同办法提出了异议,为了抗战大局,西办就主动解除了许多合同关系,长期雇用商车40辆。西办还有一个大车队,在运输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年,新疆盛世才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羊皮大衣,就是由西办大车队从长武运送到陕北去的。

另外,当时可以使用铁路军用车皮的有三个地段:西安至宝鸡、西安至涇池、西安至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明文规定,西办向前方运送枪支弹药、汽油、面粉、服装时,由经理科提出申请,经过国民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免费使用。然而,事实上不是申请了不批,就是获准了也要遇到麻烦。而西办总是从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去完成运送物资的任务。

(三)红色的桥梁

抗日战争时期,西办成为延安连接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管辖区的

桥梁。根据历史资料与老同志的回忆,大约有2万多人经此处进出延安。过往人员中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二是八路军、新四军调防的指战员,“抗大”等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同志;三是国内知名人士和外国友人;四是爱国的、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后,在这里住了较长时间,尔后又有23次过往这里。朱德在西办住过7次。刘少奇6次化名过往西办。周、朱、刘和党的其他军政领导人,在西办期间都为党的事业和党的统战工作倾注了心血。

西办接待最多的是爱国青年。他们为报效中华、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排除千难万阻,从海外、从沦陷区、从大后方来到西安,要求西办介绍他们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保证这些青年顺利去延安,西办秘书科于1937年初设立了学生股,熊天荆、布凤友、罗成君、王邦屏等负责接待工作。要去延安的青年有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持有当地地下党介绍信的;二是持有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三是社会著名人士推荐的;四是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五是什么介绍都没有,自己跑来要求去延安的。

1938年上半年,由于国共合作的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西办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而紧张,处长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接待。1937年11月,西办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说:“最近投考陕北公学和训练班的非常之多,每天总有十数起来打探消息”,“从天亮起一直缠到夜深止”,“应接不暇”,“如果‘抗大’或训练班继续招考的话,请派一得力干部来主持”。党中央采纳了此建议,同意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招生委员会”。1938年4月,“抗大”派来了柏克、鲁明,“陕公”派来了张涛,安吴青训班也派了人来,一起协助西办共同办理招生的各项手续。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西青救宣传部长胡乔木等常住平民坊五号院,亲自指导招生工作;1938年“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也亲自来西安招生,迎接200多人去延安学习。毛泽东于1938年3月14日指示,放